

橫眉集



I 206.7/1

DE76/21
橫眉集

杨志杰 刘再复

百花文艺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97620

697620

横 眉 集

杨志杰 刘再复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6 3/8 插页 2 字数 130,000

1978年9月第1版 1978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8,250

目 录

斥阴谋文艺.....	17276/21 (1)
阴谋文艺的始末.....	(8)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证	
——批判反党影片《反击》.....	(23)
究竟哪个是春天的赞歌?	
——赞《枯木逢春》，兼评《春苗》.....	(36)
阴谋文艺的理论支柱	
——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	(50)
论题材.....	(66)
春城无处不飞花	
——赞《春城飞花》，驳“文艺黑线专政”.....	(78)
评“四人帮”对《海霞》的围剿.....	(89)
“初澜”批判	(104)
是“文艺革命的旗手”，还是反革命的政治执手?.....	(123)
评黑帮文霸姚文元	(138)
鲁迅对文艺唯心论的批判	(146)
鲁迅对“求全责备”的批判	(163)
评“四人帮”的“红学”	(174)
围绕评论《水浒》展开的尖锐斗争	(187)
后 记	

斥阴谋文艺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华主席的英明论断好极了！它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深刻地揭露了这伙黑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极右实质，给文艺界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擂响了新的战斗鼓角！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都要利用文艺为自己的政治服务。

“四人帮”的政治，是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党夺权的政治，是大搞阴谋诡计的政治。这就使附属于它的文艺，也具备了“阴谋”的特点。列宁指出，反动派要不撒谎，不搞阴谋，它们的政策是一步也不能推行的。“四人帮”正是这样，这伙一无真理、二无群众、三无廉耻的败类，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穷凶极恶地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惜使用一切鬼蜮手段，包括把文艺变成资产阶级阴谋家的政治号筒，使他们抓的文艺堕落成最黑暗的阴谋文艺。

阴谋文艺，是“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直接产物。

“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一出笼，随即便派生出“写走资派”这一文艺黑纲领。

党的十大以后，早已和林彪狼狈为奸的“四人帮”，就竭力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利用各种政治运动，兴风作浪，把矛头指向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文艺领域，他们打着“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极端虚伪的招牌，开始炮制出象《春苗》这样的“写走资派”的反党作品，阴谋文艺已初露端倪。但是，“四人帮”集中地、正式地提出“写走资派”的口号，则是一九七六年二月，那正是反革命政治纲领已经制定，张春桥写出那个臭名昭著的《二月三日有感》的前前后后。二月一日，江青和张春桥调他们的死党于会泳前去密谋。江青自己撕下“京剧革命旗手”的画皮，宣布样板戏已“老掉牙了”，指令大搞“写走资派的戏”，以“配合当前斗争”。二月六日，张春桥再次找于会泳，向他指示如何“写与走资派的斗争”，如何加强这类作品的“深度和广度”，指示要敢于写更高一级的“走资派”，要敢于写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一个部的所谓“走资派”。于会泳曾经得意忘形地宣称，这个问题的提出，给文艺的发展又开创了“新的阶段”。“四人帮”为什么那样起劲地鼓吹“写走资派”？原来，这正是他们贯彻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需要。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一英明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炮制反革命政治纲领，组

织向党进行疯狂反扑，妄图一举摧毁我们党、我们军队的一整套干部，进而夺无产阶级的天下。江青所说的“配合”，就是配合“四人帮”这一反党阴谋活动。阴谋文艺，就是为了这种“配合”应运而生的鬼胎。

这种阴谋文艺，是典型的反党文艺。它的核心是“写走资派”。但是“写走资派”不过是他们的幌子，肆无忌惮地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才是它的实质。

揭露混入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确反映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这本来是非常需要的。对于象“四人帮”这样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祸国殃民的江洋大盗，社会主义文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要旗帜鲜明地加以揭露。问题在于，谁是走资派，文艺武器打击的是不是真正的走资派。而阴谋文艺里所写的“走资派”，和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两样。什么是走资派？按照毛主席的科学规定，就是那种“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而张春桥却把走资派的“本质特点”规定为所谓“顽固性”和“欺骗性”，要人们写出具有这种特点的“有深度”的作品。他们所谓“顽固性”，就是“不肯改悔”、“不可救药”。其实正是我们党内那些坚持搞马克思主义，坚持团结，坚持光明正大，坚持和“四人帮”作不妥协的斗争的革命干部；所谓“欺骗性”，照他们的话说，“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就是“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而这，正是我们党久经考验的老一代无产阶级

革命家和优秀干部。在阴谋文艺的纸页上，天要变了，共产党要下台了，新桃要换旧符了。由张春桥亲自写信，指定题材和作者，炮制的一本名为《历史的审判》的大毒草中，公然狂妄地叫嚣：曾经“把地主资本家押上历史审判台”的人，现在就要“和一切反动派一样，遭到历史无情的审判。”看，这哪里是写什么“走资派”，分明是以“写走资派”为名，表达一切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复仇的愿望，发泄他们对我们党，我们军队，我国革命的刻骨仇恨！

这种阴谋文艺又是怎样写所谓“走资派”的呢？目的的卑鄙，决定其手段的卑鄙。他们既是要挂“写走资派”的羊头，卖反党反人民的狗肉，就不能不采取鬼蜮伎俩。“四人帮”写所谓“走资派”的卑鄙手段，不外乎这样两种：一是栽赃陷害，二是含沙射影。哪一种都离不开“阴谋”二字。栽赃陷害，就是把只有他们这群政治流氓才想得出来、做得到的丑行恶德，硬栽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老干部身上，横加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他们如此栽赃诬蔑，犹嫌不足，还要给作品的主要反面人物涂上我们党的领导干部的某些外部特征，让人们从地位、资格、外貌、语言上去“索隐”，看出他们要暴露的是谁，然后对这个形象加以疯狂咒骂和丑化，这就是含沙射影。到了“四人帮”覆灭前猖狂跳梁的最后阶段，影射攻击犹不能解他们对党的心头之恨，进而用直呼其名的办法恶毒攻击党中央负责同志，这说明阴谋文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黔驴技穷的地步！在阴谋文艺的代表作《反击》、《盛大的节日》、《欢腾的小凉河》中，这几种卑劣手法都得到充分的表现。明明是他们骄奢淫逸，最放肆

地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却倒栽给我们党的省委第一书记和其他老干部身上；明明是毛主席提出、周总理宣布、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坚持贯彻的“四个现代化”宏伟规划，他们却偏偏诬蔑为“不讲阶级，不讲路线”的“发财计划”；至于“整顿”，他们更是知道这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都在报告中加以贯彻执行的，但他们却硬说是“复辟”，大肆丑化。在其他“写走资派”的作品中，“四人帮”也竭力指令他们对所谓“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等大作文章，指桑骂槐，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四人帮”利用阴谋文艺，穷凶极恶地进行反党活动，真是猖狂到极点！

为了推行阴谋文艺，“四人帮”不惜运用他们窃夺的那一部分权力的力量，一面扮演牧师的角色，一面扮演刽子手的角色。作为“牧师”，他们对作者实行“瞒和骗”的卑鄙伎俩。在政治上，他们欺骗作者说，“写走资派”是什么“党的事业”，“中央很关心”，你们有这种创作条件是“很幸福”的。在理论上，他们炮制“根本任务”、“主题先行”、“反真人真事”等各种文艺唯心论，无非是说凭空捏造、歪曲社会主义现实、从篡党夺权的主题出发进行创作有理，任意丑化和攻击党的领导、任意给“四人帮”脸上贴金有理。他们通过这种种谬论，把作者引向创作的逆流和绝路中去。对于那些不愿意“写走资派”的作者，他们则实行法西斯的“卡和压”，扬言：你不写，就不发表你的作品。卡你脖子。如果你不肯坐上他们的战车，他们就气势汹汹地

威胁，“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大帽子给你猛扣过来。如果你实事求是地写老干部，歌颂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歌颂我们的党，他们就动用行政力量，实行“砍和杀”的棍棒纪律，狂叫这类作品是“为老家伙评功摆好”，“以老压新”。轻则砍伐，重则处以死刑，打成大毒草。《洪湖赤卫队》等一些作品就是遭到这样的无情打击。总之，阴谋文艺的发展，靠的是“阴谋”加上文化专制的法西斯“棍棒”。

阴谋文艺，作为“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奴仆，它与主子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当“四人帮”猖獗一时，不可一世时，它也甚嚣尘上，乌云满天。如今，“四人帮”垮台了，它也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证明，奠基于阴谋诡计的文艺，是一定要以身败名裂而告终的。鲁迅说得好：

“文学史上，我没有见过用阴谋除去文学上的敌手，便成为文豪的人。”在剥削阶级实行统治的社会条件下是如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是如此。“四人帮”想用阴谋除去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痴心妄想。他们搞阴谋文艺，只能证明：被毛主席称之为“四人帮”的家伙，确实是一伙不择手段的鬼蜮，极端阴险卑鄙的黑暗动物！

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这种阴谋文艺的影响。在阴谋文艺泛滥期间，它的毒液曾经浸入各个文艺领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咄咄怪事：“写走资派”垄断一切，占领一切。题材一律，主题一律，人物一律，公式化，概念化，帮派化的现象极为严重。电影、小说、戏剧、诗歌、美术，以至连儿童文学，都得被逼上“写走资派”的轨道，变成“四人帮”反党的工

具。这种文艺，不仅给党的文艺事业造成极大的破坏，而且造成了极坏的思想流毒，严重地损害党的崇高形象，严重地破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重地侵蚀党的肌体。不清除阴谋文艺的污泥浊水，就没有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不清除阴谋文艺的毒焰，我们党的事业就难以兴旺发达。我们一定要彻底粉碎党和人民的大敌——“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送走阴谋文艺这个凶恶的瘟神，我们将迎来“春风杨柳万千条”的文艺春天！我们党的文艺事业正以美好之青春，展现于全世界！

阴谋文艺的始末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期，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大搏斗。带着反动阶级复仇狂热的“四人帮”，使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利用最黑暗的反党阴谋文艺，向无产阶级作拚死的斗争。

“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最放肆地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紧紧相连。这种文艺的出现、发展、灭亡的丑恶历史，典型地反映出“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极端凶恶、极端阴险的反动面目和鬼蜮伎俩，也记录了这伙反革命黑帮向我们党猖狂进攻，步步进逼，最后孤注一掷，公开发难，而终于被党和人民所制裁的全部过程。

在“反映文化大革命”招牌下 阴谋文艺的滋生

党的十大以后，本来就是林彪同伙的“四人帮”，为了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打击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让江青、张春桥“组阁”夺权，就开始煽动炮制反党的阴谋文艺。当时，他们提出的伪善口号是“反映文化大革命”。一九七四年一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帮刊《朝霞》，在创刊号上发

起“努力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生活”的征文，从而开始了一场借赋革命而反党的阴谋活动。这一阵子，“四人帮”把“反映文化大革命”叫得响极了，除了征文之外，还有训话、指示、批示，叫嚷要通过文艺给青年“补上文化大革命这一课”，要大胆写这类题材，锣鼓相当密急。

“四人帮”真的要歌颂文化大革命吗？否！他们不过是“借革命以营私”，借赋革命以实现自己卑鄙的政治目的。早在一九七二年，阴险的巨奸大蠹张春桥就提出写文化大革命的题材问题，他在上海煽动说：“文化大革命的题材没有人敢写，要有勇敢的人闯出一条道路来”，这之后，应声而起的确有某些勇敢的人——“四人帮”的亲信，炮制了象《初春的早晨》（载于一九七三年《朝霞》丛刊第一辑）等一些名曰反映文化大革命、实则猖狂向党进攻的大毒草。但是，到十大以后的一九七四年，他们则以征文等形式，大事喧哗，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相当大的声势。这决不是偶然的。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向前发展，“四人帮”把“组阁”阴谋提上日程，他们更迫切地需要文艺为他们积累更多的资本和弹药了。于是，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四人帮”，此时打起“最革命”的旗号，以写最重大题材的倡导者的面目出现，策动创作人员去搞阴谋文艺。原上海写作组、“四人帮”的亲信供认：“反映文化大革命斗争生活，不是为了回忆过去，首先是为了现实斗争。”他们的“现实斗争”，就是为实现让张春桥当总理的阴谋而斗争，这就说明了所谓“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文艺创作，乃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而呐喊的阴谋文艺。

按照“四人帮”的要求，这种文艺应当“写造反派和走资派的斗争”，即把造反派与走资派作为主要的矛盾冲突。这样，他们一方面就借歌颂造反派，塑造造反派的英雄形象来为自己树碑立传，一方面则借揭露“走资派”，而大肆丑化我们党的干部。为了给自己立牌坊，“四人帮”的亲信规定，“反映文化大革命”重点应“放在一月革命风暴夺权斗争前后这一阶段”。而他们自己又是这一阶段的“主角”，因此，“反映文化大革命”成了这样一个骗局，即文化大革命颂（招牌）=“一月风暴”颂（重点）=帮颂（实质）。刊载于《序曲》的一首诗，主角名曰“黄松”，也就是“王颂”的意思。“四人帮”在“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招牌下，炮制的就是“王颂”、“张颂”、“江颂”、“姚颂”这么一些庸俗、卑劣、肉麻、反动的颂歌。在这种帮颂文学里，“市革委老乔同志的声音”，竟“指引我们前进”，姚文元的讲话和黑文，竟成了教育工人阶级的“真正的第一课”，张姚竟成了“操马克思主义枪法”的“神枪手”，而王洪文竟成了在文化大革命史册中“写下最深刻一笔”的造反司令，作品中充满着对祸国殃民的败类无休止的令人作呕的礼赞。与此同时，他们却对我们党的干部怀着疯狂的仇恨、恶毒的敌意，把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描绘成一个“走资派网”，从上到下，实行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政”，我们的干部是各种类型的走资派，有的是“抓起生产指标来生龙活虎，提起阶级斗争一笔带过”，有的则是“抓紧教学质量”、不问政治思想。当时“四人帮”最得意的走资派典型则是《春苗》里的杜文杰，他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钱济仁的尾巴和代

理人，他卡贫下中农的脖子，打击贫下中农派来学习的女生生产队长，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造反派，搞经济主义，简直穷凶极恶！在这种阴谋文艺的画面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统统成了“反面典型”。“四人帮”根本否认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基本估计，根本抹煞我们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继续革命的崇高精神，根本抹煞文化大革命体现在干部队伍中的伟大成果。

但是，这个时期，“四人帮”关于“写走资派”的问题，尚未来得及提出系统的理论。因此，这类作品中除了含沙射影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党的领导同志之外，出现在作品中的“走资派”形象一般是基层干部，较高的一级诸如省、市、中央一级的所谓“走资派”形象尚未出现，只是在丑化基层干部时捎带几笔。所以，“四人帮”阴谋文艺的喉舌初澜在吹捧《春苗》时，关于写“走资派”的问题曾发表这样的议论说：“有必要对杜文杰这个形象多说几句。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把杜文杰写成走资派不典型，理由是他的职位不高。我们认为，杜文杰这个人是不是走资派，不取决于他的职位高低，而在于他代表什么阶级，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但在不久之后，初澜却唱出与自己“对着干”的截然相反的调子：即走资派越大越是危险。那是因为，随着阶级斗争的向前发展，随着“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形成，他们关于阴谋文艺的系统理论已经出笼，从而，阴谋文艺也发展到更加高级也是更为阴险的阶段。

“写走资派”黑纲领的出笼

在一九七六年不平常的春天里，经过阴谋策划，“四人帮”终于抛出“写走资派”的阴谋文艺的黑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刮起了大搞阴谋文艺的反革命黑风。

最先提出“写走资派”这个口号的是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大阴谋家。就在张春桥写了那个臭名昭著的《二月三日有感》的前两天，即一九七六年二月一日，江青和张春桥经过密谋之后，召集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进行密谈。江青说：“现在那些样板团演出的戏都老掉牙了，很少有社会主义时期的题材，一个也没有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内容”，“你们赶快布置给各团，把电影《决裂》、《春苗》、《第二个春天》和《战船台》改编为京剧。”最后她还交了底，说：“我和春桥商量过了。这些都是写与走资派斗争的戏，能和当前斗争配合。”所谓“和当前斗争配合”，就是和“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相配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于“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早有察觉，并针锋相对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之后，毛主席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了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工作。毛主席这一英明决策，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对于自己的失败极不甘心，疯狂地进行反扑，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四人帮”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全线出击，大

肆制造反革命舆论。“写走资派”的阴谋文艺，就是“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必然产物，它密切地配合着“四人帮”向党进攻的反革命部署。

根据“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他们重点打击的对象，是所谓“昨天的民主派，今天的走资派”。他们明目张胆地宣扬：“现在的革命对象，就是旧社会吃过糠，抗日战争负过伤，解放战争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的民主派”，现在要打倒的是“爬雪山，过草地的走资派”。根据“四人帮”这一反革命纲领的要求，张春桥于二月六日，再次找于会泳密谈，提出如何“写走资派”的问题，第一次抛出“四人帮”关于“写走资派”的理论和设想，使“写走资派”的文艺黑纲领更紧密地配合反革命政治黑纲领。

张春桥提出的是一个“写走资派”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问题。他说：“现在很需要安排文艺界写和走资派作斗争的有深度的戏。这可以说是当前斗争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心题材。”又说：“现在真正写这种题材的作品太少，《春苗》可能是第一个吧？但它只写了一个公社卫生院，概括的广度不大，思想深度也不大。应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一个部，这样的作用就大了。”

张春桥的所谓“广度”，指的是“走资派”的数量，在他看来，文艺创作打击的概括的数量越多，范围越大，地区越宽，就越有“广度”。

所谓“深度”，则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走资派”的大小，一是指是否表现了“走资派”的“本质特征”。

在张春桥看来，“走资派”职务越高，官越大，作品就